

身份认同导论

陶家俊

内容提要: 本文从 3 个层面上切入当代西方文论关键词身份认同。一、从启蒙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当代少数话语, 身份认同理论历经 3 次大裂变, 形成 3 种不同身份认同模式: 启蒙身份认同, 社会身份认同, 以及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二、以后殖民身份认同为例, 阐明当代身份认同理论内在的复杂演变。三、身份认同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身份认同 后殖民身份认同 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4)02-0037-08

身份认同 (Identity) 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其基本含义, 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 我 (现代人) 是谁? 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身份认同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具有 3 种倾向: 首先, 传统的固定认同, 来自西方哲学主体论; 其次, 受相对主义影响, 出现一种时髦的后现代认同, 反对单一僵硬, 提倡变动多样; 再次, 另有一种折衷认同, 秉承现代性批判理念, 倡导一种相对本质主义。

此类研究的主要范式, 有文化唯物论、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话语、同性恋研究等。新左派认为, 压制与抵抗、中心与边缘、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身份认同的嬗变, 因此身份认同就是权力政治的表征与产物。拉康文化心理学认为, 身份认同是自我对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认同。而依照德里达的解构延异观, 身份认同则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 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不难看出, 身份认同与

一系列理论问题相关涉, 诸如主体、语言、心理、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别、种族等。因此, 在当代身份研究领域, 我们看到各路变革势力摇旗呐喊, 开疆拓土。直到今日, 它仍在发展变化中。

众所周知, 社会文化体系好比一盘棋, 或一张巨网, 在每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 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 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 逐步确定自己在这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大概说来, 身份认同分为 4 类, 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第一, 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 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 在个体认同过程中, 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 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 集体身份认同, 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 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 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 自我身份认同 (self-identity), 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

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

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类过程动态地描摹了身份认同的嬗变机制。在自成一体的部族社会,或天人合一的封建宗法社会,姓氏、血缘、性别等共同构成了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机制。然而,资本主义现代性自上而下地改变了西方社会整个结构,也将大批化外民族强行带入了现代性的快车道。因此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我们称此独特的身份认同状态为混合身份认同(Hybrid Identity),这种身份认同也是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

身份认同的根源何在?它究竟是文化研究产物还是现代性话语派生?考其来历,可见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身份认同是新近兴起的文化研究主题。英国学者巴克说,政治斗争、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促使身份认同成为 90 年代文化研究的中心课题。^①另一位专家弗雷德曼表示,身份认同是欧美文化政治的风向标:“70 年代中期起,在美国还要更早,在普遍进步与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层面,政治文化开始了全面转向……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身份认同政治。”^②伊格尔顿进一步表示,“后现代文化是典型的身份认同政治,它是对去中心主体的顶礼膜拜。”^③另一派认为,早在启蒙哲学的温床上,身份认同便已暗结珠胎。因为启蒙哲学同时赐予现代人以理性甘露与批判利剑,它还向现代主体提供了强大反思能力。

所以说,启蒙即反思,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反思,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人的社会角色的反思。据此,拉腊因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中,围绕主体论的演变,考察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霍尔教授也从启蒙哲学后的现代知识话语入手,探讨现代和后现代主体身份认同的 5 大范式,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语言中心观以及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④

身份认同的思想渊源及发展

在其名文《什么是启蒙》中,福柯详细探讨了康德、波德莱尔及现代性。在福柯看来,启蒙是一颗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咀嚼的口香糖,是“两个世纪来被人以各种形式反复思考的问题。从黑格尔,经尼采或韦伯,止于霍克海姆或哈贝马斯,几乎所有哲学思考都直接或间接面对同一问题”。^⑤追根溯源,我们还可将有关主体及身份认同的哲学思考推及更早的时代,直至笛卡尔这一西方理性哲学的开端。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说,弗雷德曼、伊格尔顿等专家仅仅论述了身份认同的一种模式,即后现代身份认同。实际上,从启蒙哲学、马克思主义,到当代少数话语,身份认同伴随主体论的流变,历经了 3 次大的裂变,并形成如下 3 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

一、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启蒙身份认同来自笛卡尔主体论。笛卡尔的《论方法》(1637)继承柏拉图的理念观与奥古斯丁的心灵直觉论,将自我阐释成纯思的自我。自我的本质就是思想,思想卓立于世象之外,是一切存在的基石。我思故我在,强调意识

①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165.

②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 234.

③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0), p. 76.

④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ed., S. Hall, D. Held and T. McCrew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⑤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 332.

自为自在,肯定意识的怀疑反思能力,人的自我身份在此等于纯思的意识。笛卡尔式主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强调思与自我的一致和自足,他还坚信思想的我就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核心。

康德拓展了笛卡尔主体论,从此自我被贬谪尘世,又托庇理性,羽化飞升。康德1784年发表《什么是启蒙》,认为理性主体的本质就是“敢知”,而自我启蒙过程就是不依附权威,逐渐走向成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开列启蒙主体的路线图,即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直到绝对精神。他认为自我意识发展须依赖另一个自我意识,以便两者结为一种主奴关系。^①黑格尔这一论点堪称“自我/他者”关系的哲学起源。他还认为,在心智的绝对精神状态,意识克服了异化危险,与世界合一,所以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为二、二为一的关系。^②处于绝对精神状态的自我可达格物致知之境,既不受欲望、激情的羁绊,又能洞彻世界的万千幻象。虽说理性是启蒙身份认同的核心,黑格尔却反复讨论“理性狡诈”的问题。在他看来,理性作用下的自我要么与世界合一,要么形成与世界异化的死局。据此,理性只能是过程中的理性。它出尔反尔,后果难料。这一突出矛盾,在黑格尔之后的理性遭遇中不断恶化,一如《红楼梦》里那块女娲补天留下的顽石,理性被携往温柔富贵之乡,几经红尘劫数,不但受到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的尖锐批驳,还被哈贝马斯施以“交往理性”的大幅修正。

概括地说,启蒙主体论自成一派,认为人是理性统一体,能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启蒙身份认同也因此从启蒙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泛指一种身份认同模式。霍尔认为,启蒙身份认同“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其中心由一个内在核心构成……。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③

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18世纪末,受欧洲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观。它的基本看法是将自我与社会一分为二,转而强调社会作用,尤其是社会对于个人存在和意识的决定性。身份认同从此开始关注不同的社会塑造力量,以及复杂社会经验的影响。

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自我与世界的理性图式,指出生产关系才是阶级身份的决定因素,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韦伯认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同的人结成一个地位团体,其中社会身份的荣誉估价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工具理性泛滥,造成官僚科层与物化关系的“铁笼”。弗洛伊德进一步瓦解启蒙主体,在他看来,人只是在超我与自我的心理层面实现他与社会现实的认同,自我不再是认同中心,而是一个承受矛盾冲突的心理界面。在那里,社会约束力与本我的力比多相持不下、争斗不止。

此后西方的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批评等纷纷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力与历史等的决定性作用。譬如阿尔都塞认为,社会身份认同与生俱来。在强调血缘的传统社会中,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是贵族还是奴隶,是否享有长子继承权等等,都由不得自己选择。拉康强调,镜像阶段之后,孩子被迫认同于文化象征秩序中那个超验权威,即父亲或男根符号。福柯最终确认,现代权力技术已达到控制人的身体,调节人口的发达的水平。与古老权力机制不同,现代权力技术是一种针对生命的全面控制、保存与延续,而不是通过对死亡的控制来展示权力主宰的生杀予夺能力。当下西方社会的休闲活动、男女情爱、健身选美以及整个教育制度都显示:现代人的生命欲望从头至尾受到权力网络支配。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27页。

②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第566—588页。

③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75.

比较一下:启蒙认同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判断与自律精神,社会身份认同则强调社会的各种决定作用。前者突出自我完整统一性,后者承认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自我和社会构成了身份认同对应的两极。

三、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如前所论,后现代身份认同的特征乃是一种去中心(de-centering),用霍尔的话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①影响后现代认同的主要因素有三:相对主义、语言学转向和身份认同政治。

以尼采为转折,西方思想由本质主义转向相对主义。如今,相对主义成了一种硬通货,渗透整个后现代、后结构话语系统。借助相对主义势力,后现代身份认同势如破竹,凸显后现代主体危机。对此,拉腊因综述道:阿尔都塞认为主体的产生和存在依靠意识形态,福柯认为主体是权力关系产物,利奥塔认为主体是交往系统的“结点”。这些思想要么怀疑潜在统一体的存在,要么怀疑是否存在某种能产生知识和实践的物质。^②总之,后现代主体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感,它已裂解为残破不全的一堆思想碎片。

裂解过程中德里达贡献突出,依靠延异、互文等革命性观念,他彻底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与所指、语言与世界的对应整体观。德里达笔锋所向,西方逻格斯中心支离破碎,语言沦为能指符号的肆意嬉戏,世界也成了文本化世界。福柯和拉康变本加厉,要解构历史和主体。走得最远的,要数德鲁兹和瓜塔里。我们知道,欲望向来被视为需要与需求之间无法填补的空缺(lack),而德鲁兹之流声称欲望就是生产,人本是一台欲望机器。因此浮士德式的欲望主宰了人性,

理性主体也随之堕落为一种“游牧”主体。

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女权、后殖民、少数话语起伏跌宕,身份认同政治巍然成为一场全球景观: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热烈呼应第一世界少数群体的文化政治,而种族、民族、性别、阶级观念等又与种种边缘存在交相辉映。最令人瞩目的是,大批学者们走出书斋,将理论批判与文化研究熔为一炉。

后殖民身份认同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好比一棵挂满奇花异果的大树,威廉斯、葛兰西、福柯和阿尔都塞等犹如大树的枝干,各派文化研究则是树上色味各异的果实。应当说,它们受新左派思想洗礼,根源大致相同。但各派理论的内在演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从宏观上看,后殖民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实践,在《帝国反写: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美国学者阿什克罗夫特将其分为 4 种模式:1,民族或地区模式,它强调民族或地区文化特征;2,种族模式,它以种族为基础,突出文学中的种族渊源等共同特点,例如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伊斯、托尼·莫里森所表现的非洲族裔散居;3,比较模式,它解释不同后殖民文学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特征;4,复杂型比较模式,它分析混合或异体合成(syncreticity)等后殖民文学构成因素,例如奈保尔独树一帜的后殖民写作。

另一位美国学者萨贾尔则将后殖民身份认同政治分为 3 种形式:1,泛民族主义,如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和马提尼克的塞泽尔倡导的非洲人种族身份认同,即黑人特征与气质(negritude);2,民族主义,如法依强调的民族—国家理念;3,族裔散居和属下阶层(subaltern),如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和华裔学者周蕾所做的族裔散居与属下阶层分析研究。根

①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77.

② Jorge Larraín, *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 149.

据这种理论区分,后殖民身份认同政治一般要历经种族、民族、族裔散居这3个身份认同阶段:

一、种族身份认同:社会进化论强调种族的生物特征。此说上溯中世纪晚期,那时,世界被看成“伟大存在之链”,它呈等级状:一极文明,另一极野蛮。18世纪启蒙历史观认为,文明史是人类从野蛮迈向理性的历史,白人领先于其它种族,欧洲文明即为文明之巔。康德在《自然地理》(1802)中强调地理环境对于种族的影响,他说,“人类最完美的典范是白种人。黄种人、印地安人智商较低。黑人智商更低。部分美洲部落位于最底层。”^①黑格尔将人类分为高加索人、埃塞俄比亚人和蒙古人:“黑人头骨比蒙古人和高加索要窄,额头呈拱型,有隆肉,下颌悬生,皮肤呈不同程度的黑色,头发黑而卷曲。”^②相应而生的欧洲文化主义,则强调种族文化内涵,譬如文化标准、价值、信仰与社会实践。这种观念认为,种族群体的形成依赖共通的文化符号,历史、语言与文化是构成民族特色的三角支架。霍尔教授说:“种族这个术语承认:所有话语都依其地点、位置与情景而定,所有知识都有其特定语境。同时它也承认了历史、语言和文化在主体建构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③

上述社会进化论与文化主义看来都是种族主义的权力话语实践。殖民主义者将人的生物性与身体特征臆断为永恒不变的种族“纹身”,这就难免歪曲或抹杀了其它种族的历史文化。他们自诩为文明进步的代表,落后民族“合理合法”的监护人。依此逻辑,他们就有了驯服邪恶、拯救堕落的历史使命。

二、民族身份认同:讨论后殖民认同就要涉及民族国家概念,这是因为,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一种文化心理认同。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一方面依靠国家机器维护其政治统一,另一方面,作为想象共同体,它又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确保其文化统一。这包括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叙事、文化象征、宗教仪式等。

在《想象共同体》一书中,安德森教授立足比较史、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叉视角,将民族想象共同体首次置于现代性的历史框架中。他指出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人类语言变化,共同推动了4波民族主义运动:即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欧洲语言民族主义、欧洲官方民族主义、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在美洲欧裔海外移民中萌芽自有其复杂原因,这些浪迹天涯的移民生活在特定的殖民空间,与旅伴一道体验母国的歧视,因而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体验与文化心理。而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却是对前3波民族主义的模仿,其核心力量是受宗主国殖民教育的本土知识分子。相同的宗主国语言教育,相似的思想启蒙苦旅,使他们成为民族主义新一轮的播种者。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说,“民族主义本质上是18世纪晚期之后产生的现象”,^④而殖民地精英阶层是后殖民民族认同的主导力量,它“为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提供了心理聚焦点”。^⑤但是,民族国家并非单一的想象共同体,它还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另外,民族国家的古典形式也不是美洲殖民地民族国家,而是欧洲民族国家。欧洲民族国家既为后起的民族国家提供了仿效样板,也促使被殖民民族“通过反抗欧洲统治,成为民族国家”。^⑥

在《地球上苦难的人们》中,法国学者法依将后殖民暴力上升到哲学高度,他指出,殖民主义本质就是暴力,惟有后殖民暴力才能颠覆殖民统治。在他看来,城市中各阶层黑人多少都要依赖资本主义体制,因此缺乏彻

① David Farrell Kriel, “The Bodies of Black Folk: From Kant and Hegel to Du Bois and Baldwin”, *Boundary 2* 27; 3 2000 (Duhram: Duke UP), p. 109.

② Ibid., p. 124.

③ Stuart Hall,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Stuart Hall, ed., D. Morley and D. K.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446.

④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第144页。

⑤ 同上,第322页。

⑥ 同上,第318页。

底革命精神。民族资产阶级精神萎靡,民族主义政党脱离群众。因此,要实现黑非洲独立,必须依靠农民阶级。^①这里,法依的阶级分析几乎与毛泽东相似。

三、族裔散居混合身份认同:后殖民状态下的族裔散居特指以种族为纽带的少数群体,例如置身美国的黑人群体。对此,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提出了双重意识概念,他认为美国黑人面临黑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冲突,他们既将美国身份意识内化,又透过它来辨认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文化的旧影残迹。“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两面性:他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人。同一黑人身体中存在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两种矛盾的理想。”^②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1997)中,吉尔罗伊否认存在一种普遍的黑人身份认同。他提出,要仔细分析每一个黑人族裔散居群以及它同其它散居群之间的异同,从中发掘黑人身份认同所隐含的多重历史。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族裔散居身份是一种混合身份认同,它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异体合成、混合、以及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不纯文化形式”。^③他发现,现代性是造成族裔散居身份问题的主要原因,现代化、全球化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生死相搏,欧洲文化与殖民地本土文化狭路相逢。它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结成异质关系,又与当下各种政治、经济、科技问题纠缠不清,形同乱麻。^④

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中专门以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和美国的夏威夷人为例,论证全球化过程中族裔散居所造成的混合身份问题。他发现大多数阿伊努人拒绝本族身份,努力融入日本文化,但他们仍被排斥在日本民族之外。70年代他们开始重建身份,具体做法是借助旅游文化凸现自己的族群文化,譬如举办饮食节、表演公共仪式、恢复传统村社。美国西海岸的夏威夷人却有另一番遭遇。1892年,岛国君主制被颠覆,夏威夷人的身份从此渗入中国、菲律宾与

白人文化成分。70年代,他们开始反对后现代旅游消费文化。为避免成为仿真文化的牺牲品,他们目前陷入了深重的身份危机。

身份认同与文学批评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越来越强调文化与制度批判,身份认同也日益成为女权、后殖民等批评流派的主要内容。它们提倡重读文学经典,深入分析殖民霸权和男性中心文化,重写殖民遭遇中的双方历史以及两性冲突故事,以便重新确立身份认同的各种新标准。在此领域,我们目睹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颖批评著作。例如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70)便从历史、政治、心理与文学多个角度,综合解读欧美文学隐含的性政治问题。此书的著名案例涉及劳伦斯、米勒、梅勒、让·热奈等知名作家。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采用崭新视角,重读现代英国小说。他的批评主旨不单是要梳理从狄更斯、吉卜林到康拉德、福斯特的殖民文学史,更要揭示其中帝国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潜在共谋关系。

不难看出,文学如今被置于更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再也不是一块封闭领地。经典作家作品不断被人重读改写,文学批评也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它囊括了许多边界之外的问题,诸如文学与文化,文学文本与再现的意识形态机制,文学生产与特定时期的权力机制,文学、作者、出版商与读者大众的关系,批评事业制度化与进步、启蒙、解放等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张力,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渗透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政治,等等。

然而,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身份认同研究并没有脱离文学批评,相反,它竭力从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等外部视角重新阐释文学及

①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49页。

②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93), p. 126.

③ Paul Gilroy,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 K. Woodwar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335.

④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p. 163.

各种相关问题。在新的批评视野中,多种观念交叉共存,各式文本彼此互文。萨义德称此现象为“重叠的领土,纠结的历史”。问题是,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从身份认同入手,重新解读文学文本,让那些在文本中掩压已久的历史、沉默的少数声音、扭曲的种族经验以及各种边缘的身份问题一一揭开面纱,从后台走到台前?在此问题上,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和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从两方面给了我们难得的启示。

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方法始见于他的批评文集《世界、文本与批评家》(1983),此后又贯穿于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他本人对此有一说明:“对位阅读必须考虑到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抵制。”^①另外,他要求“必须将文本内容与作者排斥在外的内容统一起来”。^②阿什克罗夫特解释说,赛义德的对位阅读实为一种从被殖民者视角进行的“反读”,他同时意识到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双重历史。这种反读的目的是发掘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的内在关系,揭示帝国主义政治的文学文本化,以及文学怎样使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了作家和读者大众的集体意识。^③与此同时,这种反向的对位阅读也促使批评家以批判姿态介入针对帝国主义权力的抵制,广泛弘扬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赛义德的对位阅读帮助读者发现,18世纪的英国小说,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一一再现了殖民主义的扩张精神与征服意志。甚至在那些早期的游记、传说、日志、严肃文学作品中也伴随异域风情的描述,彰显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与欧洲中心意识。例如,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悲剧《奥塞罗》中的黑人主角奥塞罗都可算作族裔散居状态下混合身份认同的文学原型。我们甚至从《威尼斯商人》中发现,早在莎士比亚时代,反犹主义已是一个众人皆知的话题。而在传奇剧《暴风雨》中,被

放逐荒岛的普洛斯彼罗无疑是鲁滨逊这一类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原型。这些文学叙事无不生动描写了殖民遭遇、文化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换一个角度看,从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直到20世纪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以及当代印度作家拉什迪《午夜出生的孩子》,这一系列英语文学经典共同构建了300多年来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主奴身份认同史,其中福斯特的《霍华德别业》集中再现了英国爱德华时代广阔的社会画卷。借助反读方法,我们倾听到一部交织着性、性别、阶级和殖民征服的多声部合唱。小说中,威尔科克斯、施莱格尔、巴斯特3个家庭分别代表不同的英国阶层。在其背后,传统乡村英格兰与现代城市帝国对峙。威尔科克斯家族因专一从事海外贸易与殖民军事征服,成了帝国的中流砥柱。在其支配下,霍华德别业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英国隐喻,它成了异腔杂语的场所和帝国现实的复杂转喻。故事结束时,威尔科克斯先生、施莱格尔姐妹和巴斯特的儿子一起住进了这幢宽大舒适的农舍。不要忘记,是海外殖民投资和在西非从事橡胶贸易赚来的大钱为这些人提供了富裕与荣耀的经济保障。

症候阅读是指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的批评实践。书中的症候阅读分为两个层面,其一,阿氏认为,在创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对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进行了症候阅读。其二,阿氏针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行了相应的症候阅读。1840年至1844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此时他深受黑格尔、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1845年马克思与早期思想决裂,这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1845年至1857年

①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 66.

② Ibid., p. 67.

③ Bill Ashcroft and Pal Ahluwalia, *Edward Sai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92—96.

是其思想发展的过渡期;只是在 1857 年后,马克思的思想才步入成熟期。阿氏认为,文本的清晰话语之后还隐藏着一层“沉默话语”,一如意识之下潜藏着无意识。据此,阅读也可相应分为两类:一是在作者精神引导下做出的浅层阅读;二是刻意找出文本中存在的失误、歪曲、空白与沉默,将它们与明晰文字加以对比,进行深入发掘式的症候阅读。按照马歇雷在《文学创作理论》中的解释,症候阅读的目的是要从深层发现“作品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之间的关系”,^①并且在有意疏远作者的同时,贴近更深广复杂的社会历史本身。

利用症候阅读方法,新一代批评家得以重新发掘和审读西方文学史上被人遗忘疏忽的大批非经典、反经典作品。譬如 18、19 世纪之交,法国文坛有萨德侯爵作《朱斯蒂娜》、《朱莉埃特》,这位疯狂的贵族老爷恣意宣泄,大书欲望,巧说性事。英国则有劳伦斯·斯多恩作《项迪传》,他变戏法般地颠倒时序,打破作者、人物与读者间的关系,超前实践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更有歌特式小说极力渲染恐怖、暴力与鬼怪。福柯说:“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就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②这个时代的欧洲文艺对欲望执意暴

露,对创作规则大胆逾越,都可视为时代症候的种种表征。其中道理并不复杂:当资本主义以理性的名义在世俗生活中大肆推广其伪善道德时,人或者戴上理性枷锁,或者狂热追逐名利,又或在欲望的尖利嘶叫中体验生命的原始快感。

身份认同问题犹如蝉蜕之变,历久而弥新。从西方思想史看,它是现代性的产物,历经几次裂变,衍生不同范式。在文化政治意义上,它昭示压制与抵制之间的张力,凸显后殖民、女权、少数话语等文化批评流派的批判意识和强烈入世关怀。文学批评中的身份认同,将文学、文化、历史、语言等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而更将经典与通俗、高雅与大众、大众与批评家等问题纳入批评视野。因此,我们须在多层面把握身份认同的理论内涵与批判本质,动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人的命运。□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处,重庆 400031

①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2001),第 165 页。

②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第 266 页。

· 书 讯 ·

《博尔赫斯》

陈众议 著

本书作者陈众议为西班牙语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依据丰富的外文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个人体验,结合本人和学术界博尔赫斯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博尔赫斯的生平及创作进行全面而精辟的叙述和评论,文思缜密,运笔灵动,充分展示了博尔赫斯及其创作的巨大魅力和深远意义。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外国经典作家研究丛书”之一种。书内附图资料 10 余幅。

(华夏出版社)